

# 民国政府与海外华侨社会的制度化联系

□张学军

(中山大学 亚太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通过对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联系和国民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双重互动考察, 探寻民国时期政府与海外华侨的联系渠道及其制度化, 从而探讨这种联系渠道制度化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大量华侨和留学生回国参政是民国时期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直接联系的主要途径, 而驻外机构、侨媒、侨报、华侨社团、华侨学校、留学生组织则是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主要渠道。联系渠道的制度化建立于民国国籍法的属血主义原则之上, 是民国国内政治在国外延伸的主要方式, 是侨务与外交一体性的主要表现, 也对民国外交的制度化及其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这种联系跨越国家的边界, 以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种族的想象共同体拓展民国的政治、经济与外交资源, 也反映民国时期侨务与外交在联系渠道制度化上的一体性。

关键词: 民国; 侨务; 外交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 (2011) 12-0066-03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发展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时期。许多现代制度建设开始在民国时期构建, 这其中就包括外交制度与侨务制度。在民国时期, 华侨在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致辞上对华侨给以高度的评价与肯定。“华侨乃革命之母”, “我海外同志, 昔与文艰苦相共, 或输财以充军实, 或奋袂而杀国贼, 历数十年如一日, 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sup>〔1〕</sup> 在中国转型中由于独特的国外经历, 较早接触西方工业文明与制度, 他们在民国的制度建设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华侨与中国联系的制度化表现于其回国参政渠道与领域, 以及民国时期所设立的侨务、外交机构、驻外机构、华侨社团、侨报、侨媒、华侨学校、恳亲大会等, 他们塑造与维护着海外华侨社会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

民国时期侨务日益制度化, 并逐步完善, 其与外交的关系依然呈现了一体性的特征, 但是二者又不完全重合, 同时具备二重性的特点, 那么在这种特征下国民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渠道的制度化扮演什么角色呢? 本文从民国时期的侨民归国参政和政府与海外侨民沟通方式两个层面来审视政府与海外华侨社会制度化联系在民国时期的建构, 从而尝试探寻海外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与外交的互动, 及侨务与外交一体性在民国时期的建构。政府与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系渠道恰是侨务与外交手段互补性的结合点。它既可以传递信息, 亦可以作为民间外交的手段, 是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

## 一、侨民归国参政

1924年广东革命政府颁布的《内政部侨务局保护侨民专章》第一条明确指出“中华民国人民旅居外国及回国者

统称, ‘侨民’”。可以说, 侨民的概念是属血主义原则下较为宽泛的一个概念。“南京临时政府的开创性成果, 视华侨为国民, 允许归侨参政。”<sup>〔2〕</sup> 民国时期侨民归国参政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中非常普遍, 在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 侨民归国参政多集中于省府行政和县级地方政权, 并且执掌实权。在中央政府中亦有华侨参政, 但多为虚职, 并且受到排挤。但是在国民政府时期, 国民党地位稳固, 国家现代政体确立、许多归侨国民党员亦在中央任职。北洋政府时期在广东省府任职的归侨国民党员在南京国民政府政坛上迅速崛起。在任职领域, 侨务系统和外交领域成为归侨参政较为集中的领域。但是二者呈现了地域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差异。侨务系统中参政的归侨多来自于南洋, 而外交系统中的归侨多来自于欧美日。在知识结构中, 外交系统中多为长期海外生活的留学生归国, 侨务系统中多为侨商、侨领, 一般不具有较高的专业化学历。

辛亥革命以后, 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涌现一批参政归国华侨。他们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 多为同盟会会员, 参加革命斗争, 临时政府成立后, 较多任职于广东、福建两省省府和县级地方政权。广东省议会中华侨有杨永泰、温雄飞、冯自由等任议员, 李佩兰为华侨妇女代表。

临时政府和总统府中任职华侨: 司法总长: 伍廷芳 (马来亚); 总统秘书: 冯自由 (日本)、余森郎、刘鞠可、张蔼蕴、梅乔林、温雄飞 (皆来自美洲); 总统庶务处长: 夏百子 (美洲); 总统副官: 雷祝三、李达贤、伍横贯、朱本夫、邝灼、邝桓 (皆来自美洲); 全国铁路督办公署顾问: 黄三德 (美洲); 内务部卫生司司长: 林文庆 (新加坡); 外交部商务司司长: 冯自由 (日本); 国民政府临时稽勋局局长: 冯自由 (日本); 中华民国陆军部飞机队长: 李绮庵 (美洲)。

[收稿日期] 2011-05-10

[作者简介] 张学军 (1976-),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

地方政府华侨执政参政：上海光复军总司令李柱中（印尼）；广东宣抚使：黄魂苏、张蔼蕴（美洲）；广东军政府高等顾问兼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卢信（美洲）广东临时省议会代议士：赵熠、温雄飞、李恩轅（美洲）；广东省财政司司长：李熠堂；广东财政司副司长：廖仲恺（美洲）；广东省外交司司长罗泮辉（美洲）；广东省民团局长黄世仲（新加坡）广东省工务司司长程天斗（美洲）广东省教育司司长钟荣光（美洲）；广东省警察厅长陈景华（暹罗）；广东阳江民军总司令李萁（美洲）；广东新安民军总监督、开平民团总长邓荫南（美洲）；广东民军第四军参军黄作周（暹罗）；广东潮州民军标统陈涌波（暹罗）；广东惠州民军统领王和顺（越南）；广东顺字军统制、财政员黄明堂（越南）、邝锦昌（美洲）；广东高州、梅州、新会酒税委员梁少文、舒炳荣（美洲）广东海南岛林格兰（美洲）、王斧军（暹罗）；福建革命政府顾问、厦门参事会议长兼副财政长庄银安（缅甸）；福建军政府交通司司长、筹饷局总办黄乃裳（马来亚）；云南大理提督、省政府协理都督张文光（缅甸）。

在民国初期归国华侨执政参政在中央与地方呈现不同特征。华侨参政者地域分界不是明显，但是职业上较为集中多为侨商、报纸、传媒。在南京北京临时参议员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确定在参议员中设立六名华侨参议员的席位。分别是：美国《大同日报》社长唐琼昌、南洋英属侨商吴湘、留美学生朱兆莘、印尼泗水侨商蒋报和、马来亚同盟会负责人谢良牧、檀香山《自由新报》报社主笔卢信。

从中央到地方的外交、外事职能机构中任职成员多有华侨。高级职位中的归侨比例较高，且多为归国留学生。归国留学生的专业化知识结构、长期海外生活经历、语言无障碍都便于外交交涉和外交活动，在国际关系中维护国家利益。所以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职业化、专业化、精英化与归国留学生有着莫大的关系。涌现一大批职业外交家：伍廷芳、陆征祥、顾维钧、王宠惠、王正廷、郭泰祺、蒋作宾、钱泰、宋子文等人。并且驻外公使与领事以上级别的外交官皆为归国留学生。外交界中级职务中，和地方外交机构中部分华侨崭露头角。外交部商务司司长冯自由与广东省外交司司长罗泮辉分别为日本和美洲归侨。

可见，在民国时期海外归国侨民积极参政，开启海外侨民与民国政治联系的主要渠道，塑造与加强海外侨民对民国的政治认同。同时，留学生回国参政也开启中国外交职业化与精英化的道路。

## 二、国民政府与海外侨民的沟通渠道

沙恩——巴斯的国际移民与国际关系的理论模型中把海外移民视作外交中的重要因素。因为其可以作为直接或间接的信息源，帮助国家克服在处理国际问题中的信息缺失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移民亦可以利用掌握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的国内外决策，从而实现移民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最大化。在其理论中先后考察了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印度人，将其行为类型划分为三种类型：居住地积极型、祖籍积极地型、消极型。<sup>〔3〕</sup> 民国时期海外华人侨民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是一种主动型的。因为海外华侨在民国建立中的作用，以及前文所见到的在国内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积极参政，在民间积

极建立华侨和侨务组织，在国外建立华侨社团凝聚海外华人服务国内政策与海外事务，所以民国时期政府与海外侨民的跨域联系是多层面的。既有政府层面的正式驻外机构，亦有通过华侨学校，海外华人社团，海外华文传媒，还有通过主办海外恳亲活动等民间方式。

政府驻外机构是政府与国外侨民正式的、官方的沟通方式。他们向侨民传达国内政策与信息，同时向国内汇报了解的国外侨情。政府驻外机构的信息传递是双向流动的，其行为也往往被视作国家行为，代表国家利益。其所传递的信息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民国时期驻外机构主要包括：

（1）驻外使领馆。从晚清遣领馆设使护侨以来，驻外使领馆一直担任重要的侨务机构的作用，承担部分侨务管理职能。到民国时期，由于外交职业化、精英化使驻外使领馆日益规范化，遵守国际使领馆制度与国际法准则。对侨务的管理也日益倾向于法制化。除了对侨民的直接管理以外，还要了解侨情，通过华侨了解国外信息，利于国内外政策的决策。

（2）国民党海外党部。国民党海外党部也承担起部分侨务管理职能。在海外华侨中发展党员、侨党。它是海外华侨回国参政的重要渠道。国民党海外党部分布广泛，在华侨中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尤其在党国政体时期，国民党把握政权，海外侨民通过加入国民党，直达决策层。所以国民党海外党一定程度上反映海外华侨的政治利益，同时引导海外华侨的政治取向，认同于国民政府。扩大和巩固国民党执政党合法性基础。主要集中在政治上与海外华侨的沟通。国民党海外党部通过层层联系，逐渐在华侨社会中形成社会组织网络。

（3）驻外侨务官。民国时期多设置驻外侨务官，归驻外领事管理。未设置侨务官时期，其事务、职能由领事官代理。这时领事官具有了双重角色，既代表国家，亦代表民间在国际社会活动。他们的存在也反映了民族与国家在20世纪的职能边界重合，是侨务与外交一体的最直观的表现。

除了驻外机构以外，民国时期在国内直接与国外侨民沟通的方式是通过侨务委员会下设的侨务委员。在1931年设置的53名侨务委员皆为华侨。他们在侨务领域参政，代表海外侨民利益，服务国内政策。侨务委员亦多为海外侨领，容易团结海外华侨社会。通过侨务委员国民政府向海外侨民传达国内政策、形势，引导海外侨民效力祖国。

除了国家层面设置的驻外机构以外，海外华侨还在居住国与祖籍国建立一些社团、组织、学校。这在民国时期政府与海外侨民沟通交流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它们是海外华侨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地缘、血缘与文化跨域联系与认同的重要载体，并在其中发挥建构性作用。也是海外华侨在国外潜移默化自然接受的与国内沟通的方式，是长期的华人移民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这些内容今天多被视作公共外交的对象。

（1）海外华人社团。“海外华人社团及其活动在历史时期就是以跨国跨区域为特征。”<sup>〔4〕</sup> 民国时期海外华侨社团中诸多侨领在国内参政，亦有诸多侨领被聘为侨务委员。海外华人社团自身也是连接中国与居住地的地缘、血缘、业缘组织。强化海外华人的认同结构。这种跨域模式成为民国

时期与海外侨民沟通交流的渠道之一。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运动热潮中东南亚华侨建立“南侨总会”，集合南洋各地华侨社团力量，主动支援国内抗日战争，捐款、捐物。会馆作为地缘、血缘、方言群组织，与国内祖籍地联系密切。在地方政府对外沟通交流中多利用会馆。

(2) 侨报、侨媒。这是国民政府与海外侨民沟通方式之一。民国时期在国内中央与地方及国外华侨社会都办有侨报、侨刊、侨媒。政府杂志。外交部出版的《外交公报》(1921年创刊)、《外交部公报》(1928年在南京创刊月报)、《外交公报》(1940年南京创刊的半月刊)、《外部周刊》等。政府刊物的稿件来源主要由当地领事馆提供，内容多为政府华侨政策或各国对华侨有关法令，及当地华侨活动或领事馆与当地交涉情况。

1913年创办的《华侨杂志》是华侨联合会的会刊，华侨联合会是国民政府正式的海外华侨与国内联络的总机关，该刊以联络华侨、为华侨谋利益为宗旨。1932~1937年侨务委员会在文化事业科主持下，先后办有《华侨周报》、《侨务月刊》、《侨务委员会公报》、《侨务特刊》、《华侨动员》等刊物。

1940年4月在重庆成立现代华侨出版社，后改为华侨月刊社。1941年夏，侨务委员会在重庆设立华侨通讯社，发行通讯稿，向国外报道有关侨务新闻与祖国抗战消息。在侨乡存在大量地方侨刊《新宁杂志》、《恩平公报》、《新会侨刊》、《鹤山乡讯》、《新民月报》等。地方性华侨杂志如1932年上海创刊的《华侨教育》，1940年青岛创刊的《华侨》，1947南京的《华侨通讯》，广州《侨声》和《大汉华侨》，福建的《南侨通讯社——乙种稿》等。这些地方侨刊主要以信息传播为主。1920年北京创刊的《侨务旬刊》在上海设分社，在东南亚部分城市和美国的芝加哥设有海外分部，与海外华侨联系较广。侨刊是侨乡联系海外华侨的重要纽带。除了海外华侨的支持与资助以外，它们得到了侨乡地方政府的扶持，其在海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不可替代。

海外的华文报刊、传媒有国民党海外支部的机关报刊、海外华人社团的报刊、旅外华侨留学生的报刊、华商的报刊、电台等。他们在不同层面上成为海外华侨与中国民国时期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其传播的受众不同，塑造的认同对象也不完全一致。

(1) 国民党海外支部的机关报刊。印度尼西亚的“《天声日报》实际上是中国国民党巴达维亚支部的机关报，其宗旨是宣扬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政府”。<sup>[5]</sup> 1911年中国国民党秘鲁总支部机关报《民醒日报》在利马创刊；1912年中国国民党古巴支部《民声报》创刊；1915年巴拿马支部《共和报》，Chinese Times为澳大利亚中国国民党党部机关报。1919年12月20日创办于墨尔本呼吁华人摒弃宗族、党派、省籍的狭隘观念，所有华人都应在中华民国旗帜下团结起来。1921年中国国民党新西兰惠灵顿分部创刊《民声报》；1922年9月24日中国国民党驻古巴总支部喉舌《民声日报》在哈瓦那创刊。1922年11月国民党驻加拿大多伦多总支部《醒华日报》；1925年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筹备处机关报《国民

在里昂创刊，1938年法国华文《三民导报》在巴黎创刊，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机关报。1940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国国民党支部创办《侨声报》1947年7月中国国民党柬埔寨支部在金边创办机关报《公言报》。

(2) 华侨社团的报刊。1913年美国洪门致公堂主办《民国公报》在纽约创刊。1920古巴致公堂《开明公报》；1922年新加坡最早社团刊物《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月报》。加拿大致公堂1927年3月《洪钟时报》。

(3) 旅外华侨、留学生的报刊。1930年旅英华侨学生《解放》杂志在伦敦创刊；1927留英中国学生会《留英学报》；旅俄华侨协会筹委会在莫斯科创办《前进报》；1934年中华青年会大埔留日同学会会刊《大钟》。

(4) 华商的报刊。1921年1月15日新加坡闽籍华商胡文虎出资创刊《星洲日报》；印尼的新报、竞报、南洋日报，陈嘉庚《南洋商报》。

(5) 海外华侨的电台。1933年4.30檀香山“华人播音局”正式开播；1939年4.22华人唐宪才在旧金山创办美国大陆第一个华语广播电台——金星电台。

华侨学校是民国与国外联系的一条主要渠道。华侨教育一直被视为华侨社会认同形成的重要机制，也是华侨社会事务的重要内容。民国一直重视华侨教育和华侨到国内的升学。它是华侨与国内联系主要渠道。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恢复停办6年的暨南学堂，改名国立暨南学校。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抗战时期，创办三所国立华侨中学和3所国立师范学校。海外华侨也在侨居地办学校，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管理。华侨子弟的教育与回国升学塑造了政府与海外华侨独特的联系渠道，海外华侨的祖国认同通过这种联系而不断强化。

海外恳亲大会也是民国时期政府与海外侨民沟通交流重要方式。可分为血缘的宗族恳亲大会、地缘的同一方言群的恳亲大会、国民党海外恳亲大会。

这些民国政府与海外侨民沟通的渠道无疑对民国外交既有直接参与也有间接策应。作为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的主要对象，侨务塑造了政府获取海外信息的重要渠道，并直接影响双向的两大主体的利益互动，从而也成为外交领域的重要内容。从沟通渠道而言，侨务与外交具有高度的一体性，这种一体性由于国内政治的海外延伸而得到加强。■

参考文献：

[1]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编.孙中山与华侨.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6: 368-369.

[2] 张赛群.南京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研究.北京:言实出版社, 2008: 29.

[3] Yossi Shain and Aharon Barth, Diaspora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 Summer 2003: 453-454.

[4] 刘宏.旧联系、新网络:海外华人社团的全球化及其意义.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800.

[5]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 474.

责任编辑:江海洋